

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跨界整合

——世界华文文学综论

刘俊◎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跨界整合

世界华文文学综论

刘俊◎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界整合:世界华文文学综论 / 刘俊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8
ISBN 7-80148-862-8

I. 跨... II. 刘... III. 中文—文学研究—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5919 号

跨界整合:世界华文文学综论

刘俊 / 著

责任编辑:于九涛

装帧设计:第五生产队十红美人工作室

责任印制:韦舰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010-84094409

传真:010-84094789

销售热线:010-6551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北京平谷大华山印刷厂

开本:640 × 1000 1/16

印张:17.625

印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爲幸福而歌



李年楚著





萬象

第十月號

• 第一卷 • 第四期 •



• 萬象書屋出版 • 中央書局發行 •

序

丁帆

刘俊是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和负责人，同时也是我们中文系在三年前新增设的“海外华文文学”二级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作为多年的同事和朋友，我认为刘俊的为人、为文都恪守着自己的准则。

一九八八年我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和刘俊第一次见面是在叶子铭老师家中。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个艳阳高照的秋日，阳光洒满了客厅，叶门的几个弟子都在聆听着导师的讲析。作为那种学术语境下的一个“闯入者”，叶老师逐一地给我介绍了他的新入学弟子，其中一位有着炯炯眼神、中气十足、带着较浓重南京口音的小伙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后来成为我多年同事的刘俊。

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毕业留校的研究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心性散淡的人，刘俊似乎也不例外：淡泊名利，修身养性，注重内涵，不事张扬，颇有仙风道骨的君子风范。但是，其内功的修炼却是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刘俊亦如是。多少年来，他默默地耕耘在那块并不丰饶的学术土地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大陆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究圈子内，像刘俊这个年龄段的年轻学者做得如此出色者，可谓寥若晨星。我不敢妄言他的学问就是一流的，但是我绝对相信他的学问是严谨而求实的；我也不能保证他的学术思想具有巨大的创新性，但是我认为他的学术理路是清晰而纯正的。

刘俊的学术研究是从白先勇开始的，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悲悯

情怀——白先勇评传》在海峡两岸先后出版,引起了学界的一致好评。此书既有宏阔的视域,将作家作品的研究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的考察,又有精细的透析,把握住研究对象书写中的每一个细小的环节进行鞭辟入里的审察。前者需要的是研究者为文的学术气势;后者需要的是学术的基本功,二者兼得,便铸就了此书的厚重与寥廓。这一点就连白先勇先生本人也不得不对此书刮目相看。

以白先勇这样一个代表作家为突破口,切入对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这是刘俊学术攀援的第二步。经由白先勇研究,转而展开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研究,这样的学术路径,无疑是大陆研究者逐步深入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种有效的逻辑方式。沿此学术路径,刘俊的学术研究水平就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他在对大量的单个作家的个案研究,乃至各种文学现象的考察中,获得了一种最宝贵的学术经验——在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散点透视中,寻觅和总结出了具有重大开拓意义的学术命题。这都是在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学术积累上进行立论的。这一阶段刘俊的研究视阈已从白先勇延展至众多作家,其中有朱天心、欧阳子、吕赫若、王幼华、陶然、隐地、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李黎、哈金、王润华等许多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重要作家;同时,一些文学现象的研究也纳入了刘俊的学术视野,像对《现代文学》杂志、《赤道形声》选本、川端康成《古都》的借用与变异、留学生小说的发展特点、文化身份的追寻与建构、“东方主义”的“实践”等诸多文学现象的研究,提升了刘俊对问题的深入思考能力。而研究空间范围的拓展却进一步在比较视野中开拓了刘俊对问题的整体观照能力,其研究范围从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扩展至北美华文文学和东南亚华文文学等领域,这无疑使研究者获得更多学术经验的宝贵路径。

毋庸置疑,《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刘俊的学术研究进入了第三阶段的一个新的平台,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问题的提出不仅具有学术的意义,更

有学理的意义和学科建设的意义。用刘俊的观点来看：“20 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应该由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常指中国大陆的现当代文学）和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我把它称为“跨区域华文文学”）两大部分组成。因此，如果把世界华文文学视为是一个以文字（华文，汉语）建构起来的超越国界和地区的文学共同体的话，那么中国大陆的现当代文学和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即“跨区域华文文学”）原本就是一个整体下的不同指向。因此，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就理应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跨区域华文文学两方面的内容。这样，即便是以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为自己的研究侧重，也不应割裂与现代文学的联系，且不说现代文学对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只要研究的是世界华文文学，现（当）代文学就应该是这种研究的当然内容。”

尽管也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是从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格局上，对两者进行全面的观照和整体的把握，由此而在学理和学科的层面提出较全面的构想，刘俊的这本著作当是功不可没的，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那么，收在本书中的文章就是在具备了上述学术视野后，刘俊对其所有区域中的研究对象进行的散点透视。从方法上来看，似乎研究又回到了原点，但这绝不是平面的回归，而是有着螺旋式的学术升华。在重读鲁迅、郁达夫、张爱玲、朱天文等著名作家作品的背后，我们体悟到的不仅是那些细读所带来的新鲜快感，而且也看到了论者高屋建瓴式的对宏观问题的把握能力。在对许多文学现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论者的视域更加宽广，问题意识也更加鲜明多样，机智的文本与现象的解析中，都隐含着从“五四”文学到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跨区域华文文学）这样一个历史延续和向外拓展的内在理路。当然，我也不认为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论文篇篇是珠玑，但是，我却毫不犹豫地认为它们在学理和学术的层面上是有着深刻意义的，它们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建构是有目共睹的。

刘俊在他的学术领地里为人文都备受人们称赞，也受到他的弟子的爱戴。我以为，只要勤奋，凭他的禀赋和学术的潜力，完全

能成为一流学者。因为我坚信：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只有研究主体，即研究者本身的素质才是决定一切的重要因素。

我希望能够看到刘俊在学术攀援的道路上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此乃一个同事的心声，也算不为序的序吧。

目 录

序(丁帆)/1

第一辑 从“五四”文学到跨区域华文文学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衍变/10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海书写/35

“毁灭意识”和“自我表现”

——对“五四”时期一种“自我表现”式态的考察/59

论《现代》中的“新感觉派”小说/70

“跨区域华文文学”论

——界定“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新思路/80

《香港文学》与“香港文学”

——以2002年《香港文学》为考察对象/92

世界华文文学的香港窗口

——以《香港文学·小说选2·Danny Boy》为视角/103

“等待”背后的“期待”差异

——以《魔女》和《等待》为论述中心/109

古今中外:加拿大华文文学的一种特质/118

目 录

第二辑 从鲁迅到朱天文

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狂人日记》新论/126

“原欲”世界的挖掘和拷问

——鲁迅小说《肥皂》、《高老夫子》新论/142

“灵”与“肉”的冲突与升华

——论郁达夫的《迟桂花》/151

民族立场·社会关怀·人道精神·写实追求

——论陈映真的文学世界/160

时空变形后的人间生态及其意义

——论朱天文的《巫时》和《E 界》/167

论刘以鬯的《酒徒》/172

怀旧是常情

——品味董桥的《从前》/183

陶然“新概念”小说中繁富的艺术世界/187

论陶里的《逆声击节集》/191

承载历史·享受爱情·耕耘文学

——聂华苓的三生三世/198

“固着”引发的死亡悲剧

——论白先勇《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203

目 录

“施虐”和“受虐”：等待中承载的心理张力

——论欧阳子的《魔女》/215

从《四十季度》看非华诗歌中的怀乡情结/226

不自由，毋宁死

——《自由小姐》的自由与不自由/231

第三辑 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到

《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说论》

研究的背后

——读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238

说不尽的张爱玲

——评《阅读张爱玲》和《重读张爱玲》/245

台湾文学：语言·精神·历史

——评《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和理论想像》/254

孽子，我们该如何看你

——评曾秀萍的《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说论》/261

“叙事”转型和“历史”重建

——《小说香港》的特点和价值/264

后记/271

第一辑

从“五四”文学到跨区域
华文文学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衍变

一、语言观念的发展

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的百年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它在语言上的质的转变和不断演化。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根本性标志之一，就是它在语言上的重大变化。文学本来就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每一次突破和转型毫无疑问都会在语言上有所体现，反过来说，语言的每一次衍变，也都必然地意味着文学的某种发展和变革。在这个意义上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也可以被视为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衍变史。

从语言衍变的角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行考察，能够从最具文学特性——语言艺术——的角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历史的回顾、精细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能够从一个独特而又重要的方面，对百年中国文学进行富有成效的梳理并对其内在规律进行深入的探讨。当我们站在世纪末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行世纪回眸的时候，假如缺少了百年中国文学的语言衍变这一块，那这种回眸无论如何是残缺的和狭隘的。

检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衍变，首先需要弄清的，就是百年来中国文学在语言观念上的不断发展和一再变化。因为文学中的语言变化，说到底不过是语言观念在文学中的具体体现。我们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衍变，范围似乎是指一九〇〇年至二〇

〇〇年这一百年年间发生在中国文学中的语言变化,实际上,百年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衍变,其源头已逸出了一九〇〇年的时限,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适应着“世界大势”的逼迫和中国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一些仁人志士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文学在语言上进行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早在一八六八年,黄遵宪就在他的《人境庐诗草·杂感》中,明确地流露出他对文学语言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革的自觉意识:“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既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很显然,在黄遵宪看来,语言的“古”和“今”是相对的,“今”的语言对于后人也就成了“古”,因此,身为十九世纪末期的“今人”,完全没有必要在语言上被“古”所拘牵。这一思想,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在观念上语言意识自觉的先声,它所包含的内在实质其实是:“文学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而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的语言更新——挣脱“古语”的拘牵而融入“今”之“流俗语”。一八九八年,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从维新强国的角度,明确提出了将“白话”作为智民的根本,“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裘廷梁在文章中,将“白话之益”,归结为八:一曰省日力;二曰除骄气;三曰免枉读;四曰保圣教;五曰便幼学;六曰炼心力;七曰少弃才;八曰便贫民。由于是从维新的角度来考虑语言的变革,因此裘廷梁对语言的关注焦点,更多的落实在“白话”的普及和实用层面。尽管如此,他对白话的强调和提倡,事实上为“五四”时期的白话运动,隐隐地留下了历史的先导。

“诗界革命”的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间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等人以“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相标榜的新诗派,但这一口号的正式提出是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梁启超在赴夏威夷舟中,发出了“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的呼喊。在这篇后来发表在《清议报》上的《汗漫录》中,梁启超对“诗界之哥伦布、马赛郎”必须具备的“三长”进行了说明:“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梁启超这里的“新”,即是指“繁富而玮异”的“欧洲之意境语句”,“欧